



东方的复兴

何新 著

《开放丛书·思想文化系列》

第一卷·理论准备

一九八九事件前后中国问题评论

FANGDEFUXING

——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前途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东方的复兴——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前途
第一卷·理论准备——1989 事件前后中国问题评论

何新著

责任编辑：王晓明 韩继海

(精装)安振家

封面设计：
(平装)郑小鹏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哈尔滨道里地段街 179 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九站街 1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5·插页 2·字数 338 千

1991 年 2 月第 1 版·199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300

ISBN 7-5316-1291-7/Z·6

定价：6.90 元

序 言

我把这个经济政治问题论文集，作为《东方的复兴》这部著作的第一卷，在这里奉献给读者。

《东方的复兴》，是我早在15年前（1975年）即开始构思和酝酿写作的一部书。为此我在多年中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其间构思和计划不断修改和调整，直到现在终于有可能写成。在本书中，我计划写四个专题：

1. 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传播进程。
2. 研究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伴随世界市场形成、竞争和危机而同时兴起的世界霸权斗争。
3. 揭示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不断迁移，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现代中国革命。
4. 论述新世纪人类经济、政治、文明一体化的大趋势，以及这一进程所面临的激烈历史冲突，世界重新导向社会主义前途的逻辑必然性。

在这四个专题下，我试图集合我在历史学、经济学、哲学、语言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的一系列个别探索成果。我试图系统地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传统文明及其价值体系，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与新世纪背景下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命运。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十几年以来，我对我所不熟悉的知识领域

GDAB913808

曾做了艰辛的涉猎和辛勤的探索。这里献给读者的这个第一卷，实际就是我为写作本书所进行的“理论准备”的一部分，也是这一探索历程的一部分结晶。

本书所收入的文论，划分为两个时期，而以1989年4月—6月的五十天动乱为界限。

作为附录，我还收入了一些外国评论家给我的评论和信函。我还特别收入了两位过去不认识的中国学者对我思想的评论。对于他们对我的理解，我愿借此机会表示真诚的感谢。

有的读者或许不难指出，本书中那些在动乱前发表的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某些观点，与动乱后发表的观点有所出入或不同。当然，在发生了1989年那样深巨的世界性历史波折之后，如果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认识和观点竟仍然毫无变化，那就未免过于麻木不仁。然而，我也深信持客观公正态度的读者，是不难从我前后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评论中，寻绎到某种连续性线索的。

这种连续性的基础在于，我一生全部学术活动的旨归和最高梦想，就是看到我的祖国——中国——现代化，看到中华文明的复兴，看到中国的富强、光荣、进步和统一！而绝不乐于看到她沦入分裂、没落、灾难和贫困的境地，无论是如1966年那样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还是象1989年那样以全民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名义。

因此，无论人们（有人）指责我是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我对此均毫不介意。也无论是孤立、恫吓、诽谤、死亡的恐吓，甚至死亡本身，都不能阻遏我对这一目标的梦想和追求。

当然，毋庸讳言，人非天使，孰能无错？在学术和政治事业上（以及实际生活中），我生平的确犯过许多错误。但我并不懊悔。因为我的生命意识始终是真诚的。我的所思即我所言，我之所言即我所思。如果我对问题的观点有所改变，那是由于逻辑或事实的力量，而不是由于任何谄媚（这是我平生所未学会的一种人生

“艺术”)或怯懦。我的一位朋友曾说：人生中有两种情况需要勇气。一种情况是反权威；另一种情况是反潮流。但反权威即使失败，仍可以博得人们的同情甚至喝采。而反潮流，由于需要对抗多数，却必须忍受孤独与寂寞。赢了不会得到喝采，输了，却会得到双料的屈辱和失败。

我不幸而几度反潮流。但是我无所反顾。道义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不论未来如何，我的心境一向是轻松的，我对人生始终报以涵义复杂的微笑。

最后借此机会，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我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许多不相识朋友的来信——多数都是那样友善而真诚。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一向很少回信，尽管每一封信都使我感受到一份爱心。每当读到这些善良人们的来信，我就由衷感到，我并不孤独，我与“上帝”同在。这些越过山川海洋的问候和理解，使我感到了我们在心灵上的共同存在与我们所坚守的共同价值。感谢你们。你们使我在隔绝与孤独的处境中获得慰藉。使我在软弱中获得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我无比珍惜这种慰藉和精神力量。但，请原谅我没有给你们回信。这绝不是由于我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不想用我的语言，而是用我的思考、信念、奋斗来回报你们，回报我所深爱的这个祖国、这个民族、这种文化传统和中国人！

在本书整理和编集中，张莉女士付出了辛勤劳作。本书出版，得到了张文达先生的无私支持。在此均谨致以由衷的谢意！

何 新

1990年12月24日

目 录

导论·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问题…………… (1)

1989 事件后中外记者答问录

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

——何新在北京大学对 1990 届毕业生的演讲…………… (33)

己巳之乱后的冷峻反思

——新华社记者吴会劲、中国教育报记者符文

采访录…………… (72)

论政治民主

——答一位美国外交官舒先生的提问…………… (94)

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若干问题

——何新与意大利安莎社记者芭尔巴拉(Barbara

Agency)的对话…………… (105)

关于 1989 年中国形势的谈话

——《澳大利亚经济评论(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记者 Michael Byrnes 与何新的采访对话…………… (125)

关于政治改革问题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史砚华采

访何新…………… (131)

关于中国的民主与未来

——何新与法国经济学家、记者索尔曼的谈话…………… (145)

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 S 的谈话录…………… (165)

附：一篇失实的通讯

——兼谈矢吹晋一事的真相…………… (206)

我与我的祖国

——何新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克利斯朵夫

(Kristof) 的对话…………… (210)

海湾战争的背景和原因

——何新接受日本共同社记者伊藤正采访的谈话…………… (237)

政治经济问题评论(1989 事件前)

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 (257)

中国当代文化备忘录：我的困惑与忧虑…………… (282)

从通货膨胀恶性化探讨近年经济改革失误的原因…………… (309)

“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 (344)

政治经济问题评论(1989 事件后)

中国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历史评价…………… (355)

附：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速度……………陈文鸿(368)

中国经济近期会否崩溃·····	(371)
中国经济若崩溃将牵动世界动乱·····	(374)
东欧变局下的世界形势展望·····	(376)
中国未来两大前景·····	(379)
关于我国经济改革问题的意见书·····	(382)
我国经济病症的成因和根治方案·····	(396)

对几本书的评论

理解世界战略形势的一把钥匙

——读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415)

美国世界战略的总体设计

——关于布热津斯基的一本书····· (423)

美国梦的破灭····· (428)

附 录

深沉的忧思 执着的热爱

——论何新的文化学研究····· 方 莹(443)

作为不发达国家寻求正义与自由思想体系的社会主义

——读何新《谈话录》后所思····· 石 中(454)

国外来信对何新与外国记者谈话的反应····· (461)

附：美国学者鲍伯·切尔德(Bob Schilden)写给何新

的一封信····· (466)

导论·中国现代化的 的命题与问题

1

本书主题，是试图比较全面和系统地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起源、目标、困难、问题与前景，以及这一进程对于第 21 世纪人类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写这本书，首先是为了澄清我个人近年思想中的某些困惑。但另一方面，本书的题名在十五年前已经确定——要写这样一本书，又是来自我个人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其最初形成，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化革命中的 1974 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继 1964 年于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现代化”问题的十年之后，再度提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命题。当时有些人就已经意识到，这次会议和这个目标的重新提出，具有划时代性的意义。这不仅意味着时代精神的一种深刻转变——也预示了文革作为一个时代的即将终结。同时深刻提示了在文革后的新时代中，中国社会所将面临的一项重大的长期性主题。

当时我虽然僻处穷边，但这一主题却深深地激励和振奋了我，引我思索。使我如同拨云驱雾一般从当时尚硝烟弥漫的文革风云

中，豁然意识到一个崭新历史时代即将到来。

恰好其时我正在阅读斯宾格勒写于本世纪初的名著《西方的没落》。此书风格怪诞、神秘、夸张，充满了关于人类历史非常富于主观性和玄学性的唯心主义幻想。但是尽管如此，在深入阅读之后，我仍然意识到这是一部才思横溢的著作。

重要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若干基本意念，竟为 20 世纪后来的事变所证实。特别是他的西方文明将走向没落的预言，在 20 世纪的晚期，已经愈来愈清晰地显现在当代历史中。（对于这一点，国内某些为西方当代的富裕生活和高发达科技表象所迷惑的朋友，可能还会表示怀疑。但是，许多当代权威的西方学者却根据统计材料而并不怀疑这一点。实际上，当代西方人对于日本、中国和亚洲新兴国家的高度关注、重视、戒心甚至敌视，正是来自对于西方没落和东方复兴这一历史潜在趋势的深刻忧虑与关注。）

虽然我当时的哲学背景、理论和知识水准，使我远不具备把握这一重大主题的能力。但是，我还是试图紧紧地抓住它。在其后多年的时间里，我反复不断地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不同的学术角度，反复追踪思考着这一主题，就是：

——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机会，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经济和文明群落，能够获得一种伟大的、将给人类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复兴？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的话，那么将其转化为现实需要具备哪些精神和物质条件？

在历经十五年沉重而痛苦的探求和思索之后，对于这一历史趋势，我具有愈来愈强烈的信念和愈来愈清晰的认识。因此，我现在向读者献上这部著作。

东方将走向复兴，最早预感到这一重大历史主题的思想家似乎正是列宁。他在生前所写最后一篇读书札记中，思考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时，注意到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由恰处于东、西文明交汇处的俄国，向东方的中国和东南方印度的传播。他指出，在这些人口无比众多、国情无比复杂的东方国度中，这种革命无疑将具有某些更独特的意义。

对于塑造 20 世纪现代中国的两位历史巨人孙中山和毛泽东来说，复兴中国和东方，不仅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且是一个被确认无疑的信念。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系统而清晰地规划这一目标。而毛泽东，当他在建国之初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他无疑确信这将是中华民族及其文明走向复兴的起点。

我们特别应该注意到，毛泽东具有宏大超人的地理战略眼光。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他没有把这一革命的意义仅仅局限在中国自身之内。相反，他的目光马上投射到朝鲜、印度支那及其周围的泛东方地区，甚至更进一步越过这个地区，而扩展及于整个“亚非拉”地域，后来发展成为他 70 年代中期所阐述的“三个世界”斗争的概念。

实际上，正是由于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国际政策和实践，才根本改变了雅尔塔会议上超级大国试图强加给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战略形势和大国利益分配地图。正是毛泽东引导了 20 世纪中期亚、非、拉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毛泽东以无比的英勇气概和历史智慧，对超级大国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并且确实对之形成了深刻的战略威胁。他使 50—70 年代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获得了超越自身经济实力的战略性地位。正

是毛泽东赋予当时的第三世界以一种战斗性的思想意志，从而深刻影响了将近三十年中的世界历史潮流。

在1959—1960年间的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毛泽东注意到世界革命中心于19世纪以来由西方欧洲向东方转移的进程。他要求60年代的中国，承担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重任。甚至，他之所以发起失败的大跃进和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相当重要的意义上，也都正是为了自觉地呼应和实现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使命。

然而，形势毕竟比人强。作为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者，毛泽东那些富于创造性然而却脱离了现实的经济试验和政治宏图，并未一一如愿。但是，由于毛泽东具有伟大、深刻而超越历史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他的许多历史预言，却仍然以人们所未曾预想的一种新情况，而在当代经济、政治的现实中得到深刻印证。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所关注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和东方作为政治巨人的崛起。然而对于当代世界来说，一种更有力的现实，却是东方地区作为经济巨人的崛起和振兴。一方面，日本和所谓“旧四小龙”（南朝鲜、台湾、新加坡、香港）、“新四小龙”（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太平洋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当代异军突起，其实力、潜力与势头，已对美、欧诸传统强国形成日益有力的挑战。

另一方面，四十年来尽管不断面临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的重重经济、政治封锁与遏制，尽管充满失误与挫折，尽管困难重重、矛盾重重，甚至今日潜伏深刻危机，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革命仍然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惊人成功。就中国综合的总体国力看，在多方面实际也已经达到中等强国的水平。（本书中有详细数字及比较）

事实上，在今日世界中，没有任何地域的经济比东方地区更富有朝气、活力和潜力。也没有任何地域象东方这样蕴藏着丰富的

人力储备、资源储备、资金储备和待开辟的市场空间。

近四十年来,自地中海东翼到太平洋的广阔近东、东方和远东地区,取代16—20世纪前半期近五百年内的大西洋、地中海西翼地区,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主要焦点和舞台。正是东方经济、政治在二次大战后的崛起,主导和牵引着四十年来的世界性变革潮流。毫无疑问,这一地区也势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竞争和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地区。

对于世界来说,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有待开拓和不断重新认识的新大陆。尽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至今依然艰难重重。但是,从古以来的中国历史都正是多难兴邦。如果我们回顾自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以来,直到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无数当代志士们,一个半世纪以来,一代接一代的爱国者为了这个民族的独立、富强、振兴和现代化所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我们不仅会惊讶这一历史所具有的惊人的连续性,而且会惊讶中国人的如此坚韧不拔!我们更会意识到,追求富强和文明复兴,既然已经有五、六代人为之披肝沥血、前仆后继,既然已经是席卷和涵盖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主题,那么,它就决不会被今后的中国人所真正放弃。不管还会有多少曲折、险阻和疑难,当中国人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时,是决不会后退的。

东方在复兴,中国也必须复兴!而为了实现这种复兴,首先必须追求中华民族精神、斗志和信念的复兴。这一点,也就是本书所欲紧紧抓住的一项最重大的基本主题。

3

本书的初稿,在1989年的动乱之前曾经写就,并在海内外若干杂志上发表过其中的部分篇章。但一年前写此书时,我正怀着

对于国运民生的一种深沉忧虑——因为坦率地说，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赵紫阳先生若干经济政治方略的严重偏误。因此在本书原稿中，我坦率直陈了对赵政策的某些批评意见。我当时还曾经预测，如不扭转其偏差，中国很可能将会陷入大动乱和国家分裂的危亡局面。

同时我还曾警告：中国现代化这一经济政治目标始终与若干超级大国谋求世界性经济政治霸权的战略利益相矛盾。当世界是两极化时，某一超级大国可能会谋求打“中国牌”，借助中国以图牵制对手。但随着世界多元化趋势的加强，传统超级大国实力地位的下降，国际战略形势正在重新组合，打“中国牌”现已不如70年代那样重要。因此，某些西方大国近年对中国改革所实施的战略方针，始终是谋求以中国为战略工具，口蜜而腹剑。其最终战略意图，从根本上说，是延滞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甚至致中国于解体破碎分裂之局。（直率不讳的“中国解散论”、“三百年殖民地而后现代化论”，以及似乎较富学术性的改造中国为“联邦”或“邦联”论等等——实际就是主张中国实行分土裂国的新“封建论”，无论其言者是否自觉，其源却盖出于此。实际间接充当着超级大国在中国实现其战略意图的工具。）最终目标，则是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在未来成为其强大经济政治对手这一隐患。

但遗憾的是，我当时的批评和警告并未引起重视，还受到了“智囊团”中某些人的公开敌视和批驳。此外，今年四月初（动乱发生前夜），我所在部门的一位领导也曾善意地转告我，很接近赵的某智囊人物指责我的议论“危言耸听”，要我注意。然而不幸的是，我对动乱的某些预测，在1989年的动乱中竟得到了局部的证实。

平定动乱后，国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本书初稿中针对当时某些特殊政策和失误的分析和批评，现在也已不复必要。所以在这部新稿中，我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研究有关中国现代化理

论的某些更具有基本意义和普遍性的问题，在内容上作了重大调整。只是，我仍然把我在1988—1989年初发表过的几篇原稿附录于书后，供有兴趣的读者分析、参考。

4

此次动乱后，知识界某些朋友写信质疑我对于1989动乱所持的反对态度。本书在理论上对有关的质诘有较全面的答复。

此次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几乎把中国推到内战、分裂和灾难的边缘，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但也与多年以来某些流行时髦理论对于近代西方历史、对于中国传统文明和当代现实估价失当，对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目标等理论问题见解偏颇，以及此类偏见对社会误导，具有密切关系^①。

兹以民主问题为例。实际上，中国古典社会，绝非如某些极端反传统者（如《河殇》派）所说“只有专制制度而没有民主意识”，或“只有奴性而没有人性”。如果注重实质而不是简单考虑形式，我们就会注意到，民主在中国，也曾具有其悠久而深刻的传统。

在《尚书》、《左传》等远古经典政治文献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自尧舜传说时代至于春秋，中国曾存在过氏族民主与贵族民主的古老政治传统。而在儒家的若干经典文献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大量关于“贵民轻君”、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具有强烈民主色彩的政治议论与教诲。

问题在于，这种政论和教诲，远非仅属欺人之谈或不具有实践政治意义的盲目说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些政治典训不仅

^①我近年的探索中，虽然始终坚持反对“现代化即全盘西化论”（可参看《何新集》），但某些议论难免亦会有所偏颇、本书可以体现我对有关问题所作的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教化出了无数为国为民，敢于以匹夫之志抗命强权的仁人志士；而且作为一种实践的政治理论，也形成了在古代限制君权、抑制官吏特权、表达民意和公众政治批评（如著名的“谤木”设置），建议、规劝、弹劾、监察，以至合法废立皇帝（“禅让”）的一整套相当成熟而具备若干基本民主功能的法制、政治制度和传统。

这一套制度，之所以说是成熟的，因为它在几千年历史中是在不断被改进和完善的。当17世纪自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们，将康熙时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介绍给法国路易十四这位当时在欧洲享有“太阳王”之称的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君主时，这位“太阳王”对中国君主制下仁慈明哲的统治方式极口赞美，甚至试图研究和引进之。我们不要忘记，17世纪欧洲已经进入所谓“启蒙时代”。（中国文明对于欧洲“启蒙”事业发生过深刻影响，正如中国四大发明对于近代西方技术发生过深刻影响。这一点研究当时一些传教士和启蒙学者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但可惜而惭愧的是，我们当代人却往往数典而忘祖。）

在古代中国，固然没有希腊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但绝非根本没有“民主”性的概念。中国古代的民主，也许更注重的是实质而不是形式。事实上，如果不曾发展一套能够适当吸收和容纳民众意志、在一定限度内承认臣民权利的政治制度和机构，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朝代就不可能延续那样漫长的时间（秦、隋、元等少数几个皇朝，武功强大而滥用暴力，正是由于政制中缺乏民主机制而暴亡，则恰是反面的例证）。实际上，古代中国人并非真是那样易于统治的愚民、顺民。故雄才大略如唐太宗者亦曾自诫：为政者当常思水能载舟亦能覆之。与沉湎忘情于宗教狂热中的中世纪西方人相比，也许当时的中国人反倒是更富于批评和反抗精神，而难于治理的。（所以中国历史中的平民起义就远较西方中古历史中次数为多。）

当然，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形式，中国需要借鉴。但是，这种借鉴不应当是全盘照搬。中国有自身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故中国的政治民主和政治改革，应当首先从总结中国历代和当代的政治经验和教训出发，同时也参照借鉴西方经验和形式，以政治稳定和发展经济为前提，循序渐进地推进。否则，就必致社会于动乱。

是否具备西方的形式民主制度，不是、也不可能是权衡一切社会民主真正程度的唯一和绝对标准。事实上，照搬和模仿西方多党政治以及议会民主制度的道路，中国在本纪世初辛亥革命后摹拟欧美制定的宪法中，在北洋政府的宪政时代以及蒋介石时代修订的民国宪法中，都曾经多次试验过。但由于完全不合国情，结果弊端百出而终致失败。

后来，国民党在台湾多年并未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在近期经济起飞后才开放“党禁”）。日本明治维新后，虽然在政治法制的诸多方面借鉴西方，但始终并没有全盘照搬西式政治民主制度；直到当代，虽然议会中有多党参政，但长期也是自民党一党执政。香港政治虽然是英国在治理，但并未照搬英国政制，因而素来以“有自由无民主”著称。南朝鲜、新加坡也都没有模仿美、英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由此观之，亚洲诸“小龙”虽实行资本主义，却也都并不照搬西方一切政治制度。

由此足见，西方式民主制度，既非一切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道路，也并非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发展所必须的政治前提条件。若必以二者为因果，则首创西式民主制的古希腊、近代较早建设议会民主制的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即都应当最早成为现代工业化强国。但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谬以为，衡量现实中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好与坏，标准仍然应当是实践。在设计和构造任何制度的改革方案时，首先应当考虑多方面的社会客观条件。